

宋代诗歌分题分韵创作的活动形态考察

吕肖奂

(四川大学 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宋代的分题分韵活动,一部分作为宴饮游戏活动的次要部分出现,娱乐性较强;一部分在具有诗会性质的期集或偶集上出现,也伴随棋酒游宴,但诗歌创作与竞技性占主导地位。不同的创作语境中诗人的创作心态自然有别,但对大多数现场与非现场的品评者而言,速吟而精准的产品,无疑是具有普遍性的标准。宋代士人的阶层意识与风雅追求,推动了兼具竞技性与娱乐性的分题分韵活动的发展与普及,并使之固化为一种知识层习俗而被长久传承发展。

关键词:宋代分题分韵;两种生产语境;普遍标准;普及阶层;中等规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3)04-0054-07

分题分韵赋诗活动在南北朝时期(一般认为在齐梁)产生^[1],经过隋唐发展,唐末五代时期已经屡见不鲜,到了宋代,这个活动更是成为文人集会不可或缺的正常行为。宋代的分题分韵活动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哪些传承与发展?宋人如何看待分题分韵活动与诗歌?本文试图作总体考察。

一、酒席上的分题分韵:作为游戏组成部分的诗歌创作

窦华《酒谱》之《酒令》云:“今之世酒令,其类尤多:有捕醉仙者,为偶人转之以指席者,有流杯者,有摠数者,有密书一字使诵持勾以抵之者,不可殚名。昔五代王章、史肇之燕,有手势令,此皆富贵逸居之所宜。若幽人贤士,既无丝竹金石之玩,惟啸咏文史可以助欢,故曰‘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新吟胜管弦。’”^①自视与“幽人贤士”同道的文人,到宋代已经有了明确的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集体自觉意识,这个意识促使他们有意在各个方面与众不同,即便是宴席上的常见的酒令,也要努力求雅求新,分题分韵就是在这种阶层自觉中不断发展的“雅令”与“新吟”。

分题分韵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酒、酒令有密

不可分的联系,这与赠答、寄题、和韵、次韵等酬唱活动产生的语境和方式不大相同,而具有十分突出的游戏娱乐性质。晚唐五代时前蜀诗人张蠍《送薛郎中赴江州》云“听事棋忘着,探题酒乱巡”,就谈到了政事、创作与棋酒休闲游戏之间的冲突。“探题”与行酒常常在宴席上同时进行,诗人探题后即需命篇构思、遣词造句,不免会影响到行酒的次序与速度,而带有赏罚性质的行酒自然也会影响创作,这使得酒席上的创作常常会顾此失彼。

仅仅行酒还不够,分题分韵还有规定时间,而且时间越短越好。《南史》卷五十九:“竟陵王子良夜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从此,刻烛成诗、击钵成诗,成为诗才敏捷的象征,在分题分韵活动中一直盛行不衰。华镇《云溪居士集》云“刻烛分题喉每噤,挥杯多酌指如丛”,陆游《剑南诗稿》云“下尽牙筹闲纵博,刻残画烛戏分题”,陈师道《后山集》云“坐想明年吴与越,行酒赋诗听击钵”,王之道《相山集》云“可恨探题仍击钵,敢辞偿令独浮觥”,可知两宋时期这种行酒时以“刻烛”、“击钵”记

收稿日期:2013-0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11BZW048);2009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9-0569)

作者简介:吕肖奂(1965—),女,河南灵宝人,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①见元陶宗仪《说郛》卷九十四上《酒谱》。作者窦华,又有窦革、窦平、窦革之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酒谱》提要,考证《酒谱》作者为窦革,认为作窦革者误。但四库本窦革《酒谱》只有一卷数条而已,说郛本《酒谱》分12节,条目多于四库本数倍。据说郛本结尾“次公实子野题”,窦华正是四库所云仁宗时期之窦革字子野。“闲征雅令”一联出自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时催诗罚酒的游戏一直在延续。如果说这些诗句还带有用典意味,并非纯粹写实的话,那么李弥逊《岁后三日,与罗叔共、二邵、似表弟,席上分“梅花年后多”^①韵,得“多”字,刻烛成》,就是刻烛分韵赋诗的纪实。

又饮酒又记时,短时间内受着干扰创作,无疑增加了创作难度,但当时文人却乐此不疲。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云:“政成之暇,延四方之名俊,摘邵伯之荷蕖,传花饮酒,分韵赋诗,徜徉乎其中,不醉无归,载月而返,亦风流逸事也。”从中可知,“分韵赋诗”在宋代已经与“传花饮酒”一样,是文人集会时不可或缺的雅致游戏。诗歌创作能够成为游戏,自然建立在整个时代诗人创作普遍相当熟练快捷的基础上,而宋代正是经过了诗国高潮之后,诗歌创作进入更为普及化、熟练化的时代。

宋代酒令花样繁多,多是有趣的文字游戏^②,而诗人们则喜用分题分韵赋诗这种更具创造力的方式以代替酒令,如贺铸《渔歌》。甲子十二月,张谋父、陈传道、王子立会于彭城东禅佛祠,分“渔、樵、农、牧”四题,以代酒令。予赋渔歌》,就是以分题赋诗的方式代替了一般酒令。诗歌在这里,无疑是高一层次的文字游戏。

宋代文人还发明了不少新的游戏规则,譬如陈襄《潘家山同章衡诸生饮次行令,探得“隐君子”,为章衡搜出,故赋诗云》,这是一首酒席分题诗,诗题与诗歌并无什么特别,但诗后之自注,却记录了一次颇为复杂有趣的探题赋诗行令的游戏新规则:

每用纸帖子,其一书“司举”,其二书“秘阁”,其三书“隐君子”,其余书“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举”则司贡举,得“秘阁”则助“司举”搜寻“隐君子”,进于朝矣。搜不得,则“司举”并“秘阁”自受罚酒。

后复增置新格:“聘使”、“馆主”各一员,若搜出“隐君子”,则要此二人伴饮。二人直候“隐君子”出,即时自陈,不待寻问;“隐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违此二条,各倍罚酒。(自注:聘使,盖赏其能聘贤之义;馆主,兼取其馆伴之义。唐有昭文馆学士,人号为馆主。)

(一)“秘阁”虽同搜访“隐君子”,或“司举”不用其言,亦不得争权,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举”不用己言而辞同罚也。然则倍罚。

(二)司举、秘阁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发问,如违,先罚一觞。

(三)司举、秘阁止得三搜,客满二十人,则五搜。

(四)余人探得帖子,并默然。若妄宣传,罚巨觞,别行令。^{[2]5075-5076}

这是将朝廷馆阁搜访隐逸之举挪移到诗酒游戏之中的做法,反映出宋代官僚士大夫的生活习惯与趣味。游戏的难度与趣味性增加,而分题赋诗只是这场游戏中一个极小的环节,是与酒相对等的“罚资”。分题分韵的游戏化、娱乐性在这个游戏规则中表达得十分突出。

可以看出,这个游戏规则并非陈襄或个别人偶然性的行为,而是一群人经常实行、不断完善而成的。他们不满足于前人已有的游戏规则,于是试图增加游戏的难度以提高游戏的知识性与娱乐性。而分题分韵在难度更高的复杂游戏中显得更加无足轻重。

二、诗会性质的分题分韵:诗歌创作游戏的严肃化

以诗歌创作为主题的集会,在宋代并不少见。在这种集会上,分题分韵常常成为整个活动的主要内容,而游宴只是诗歌创作的具体语境,或只为创作提供素材与话题。

一些集会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认为,分题分韵赋诗活动比较安静优雅,可以代替热闹喧哗的饮酒,如杨亿《武夷新集》之《冬夕与诸公宴集贤梅学士西斋,分得“今夕何夕”,探得“云”字并序》云:

星汉倾颓,因念夫饮酒者,未尝不始于治而卒于乱,盍各吟咏,以止喧哗?于是迭出巨题,互探难韵;构思如涌,弄翰若飞;至于断章,曾未移晷;藻绣纷错,金石铿锵。足以知周南变风,诚二雅之可继;郑卿言志,岂七子之足多。

认识到饮酒的弊端,同时就是认识到分题分韵创作的优长,这是时人难得的清醒。诗歌创作不只是可以代替酒令,此处还可以取代饮酒。耽于“巨题、难韵”的吟咏,宋人的集会也因此而更加清静文雅了。韦骥《钱塘集》有“击钵题诗助清旷,藏阍传令止喧哗”之语,就是对这种连集会都求“清旷”的赞美。众人集会而追求“清旷”,也可算作宋人渐趋内敛沉思的一个标志。

^①此“韵句”出自杜甫《江梅》:“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关于分韵之“韵句”,参见另文《宋代分题分韵:更有意味意义的创作活动形式》。

^②详参说郭本夔《酒谱》之《酒令》十二。

有些定期举行的聚会,会将分题分韵赋诗的游戏规则严肃化、严格化。朱熹曾因在一次分题分韵赋诗中“擅场”,而被推举为同人集会之盟主,也就是话语权威,在此后的集会上,他为了整肃纪律,严格行使赏罚主权,使得分题分韵活动变得严谨规范。朱熹的一首诗题很详细地记载了这个过程:《巢居之集,以“中有学仙侣,吹箫弄明月”为韵,探策赋之,而熹得“中”字,遂误为诸君所推高,俾专主约。既而,赋诗者颇失期,于是令最后者具主礼以当罚。乃稍集,独敦夫、圭甫违令后至。众白,罚如约。饮罢,以“苍茫云海路,岁晚将无获”^①分韵,熹得“将”字。而子衡兄得“苍”字,实代熹出令》。

从朱熹诗题可知,至少在南宋中期,就有这样严格的诗会制度:与会者根据某一次分题分韵活动,推举其中诗歌水平最高的人,也就是“擅场者”作为此后同人集会的“主约”人。这种推举证明,当时分题分韵活动中或者设有专职或兼职的诗歌评审者,或者是集体参与评审,然后进行公推。“主约”人成为此后集会的组织者或主持者,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集会,进行有组织性的创作活动。“主约”人会从前人诗歌或文献里选好符合本次集会主题的“韵句”,然后随机分韵给“赋诗者”,“赋诗者”当在规定时间内写好诗、按时上交,违约者受处罚。这是一个程序十分严格的期集赋诗会,其组织甚至符合今人观念上严格的诗会标准,这种诗会当然绝非只此一家。

朱熹对此种集会十分热衷,他的诗集里有很多首诗题记载了他们的诗会活动,如《闰月十一日月中,坐彭蠡门,唤船与诸人共载,泛湖至堤首,回棹入西湾。还,分韵赋诗,约来晚复集,诗不至者,浮以大白》^②,可知这次是同人共游之后分韵赋诗,赋诗时间为别后一日夜,比刻烛、击钵、酒席上的时间要充裕得多,给诗人充足的创作时空。这显然要更符合创作规律一些。又如《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结客载酒过伯休新居,风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践约。坐间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韵,熹得“中”字,赋呈诸同游者》^③,这是一次延期的“诗会”,“二十字分韵”意味着有20人参与这次集会,规模可谓宏大,“韵句”的出处与语意,点明了此次集会的主题是要仿效陶

渊明《游斜川》。这种分题分韵活动无疑要比酒席上的游戏严肃规范得多。

这种诗会性质的分题分韵赋诗活动,在宋代似乎比游戏性质的同类活动更为盛行。诗人们在这类活动中,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如冯时行等15人曾于绍兴三十年(1160)12月在成都一个梅林集会,事后冯时行所写的《梅林分韵诗序》云:“酒行,以‘旧时爱酒陶彭泽,今作梅花树下僧’为韵,分题赋诗。客既占韵,立者倚树,行者环绕,仰者承芻,俯者拾英,吟态不一,皆可图画。”形象描述了分韵赋诗时诗人们的各种创作情态,即便是伴随着行酒,“赋诗者”们也一丝不苟。这应该是诗人在分题分韵活动中比较常见的“吟态”。

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云:“寇莱公一日延诗僧惠崇于池亭,探阄分题,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韵,崇得‘池上鹭’、‘明’字韵。崇默绕池径,驰心于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点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到,方今得之。’丞相曰:‘试请口占。’崇曰:‘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终未惬,不若且罢。’虽是仅有二人的既分题又分韵的赋诗活动,但这个创作的过程记录,让我们感受到分题分韵诗歌创作的不易。

随机选取的“题”与“韵”,实质就是限定了本次创作的内容与形式,诗人要寻找出内容与形式的契合点,具有相当的难度。“韵”字常常强制引导诗人思考的方向,如惠崇与寇准要分别努力找出“鹭”与“明”、“柳”与“青”之间的关系,其关系不仅要恰当,而且要新颖,这的确是让诗人绞尽脑汁的创作方式。在这里,一首诗要耗费很多时间,“刻烛”、“击钵”无疑是过求速成的苛求,“自午及晡”的苦吟,才是符合分题分韵创作的一般情状。林逋《林和靖集》云“山落分题月,花摇刻句风”,将“分题”、“刻句”的苦思冥想、费时绵长写得诗意盎然,可能因为他从那种苦吟中体验到了创造的乐趣。

分题分韵赋诗本来是文人聚会游宴时的休闲娱乐活动,却因为诗歌创作并非简单的轻松游戏,而是需要创造性的劳动,所以这种休闲娱乐绝不轻松,而

①前一次韵句出自丘丹《奉酬韦应物》:“中有学仙侣,吹箫弄山月。”此一韵句出自韩愈《杂诗》四首之二“苍茫云海路,岁晚将无获”,稍有变化。

②此诗自注云:签判“渺”、教授“空”、知县“望”、吴学录“柱”、掌仪“明”、大彭兄“兰”、判官“击”、南公“一”、小彭兄“遯”、彦忠“人”、直卿“余”、公度“浆”、敬直“怀”、卫父“流”、晦翁“光”、泰儿“美”、“棹”“方”。可见参与“赋诗者”人数不少,当用苏轼《赤壁赋》“桂棹兮兰浆,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而不全。

③陶渊明《游斜川》序云“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后20字:“中觴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是在有限时间中对诗人诗才诗思进行着巨大考验。诗会性质的分题分韵，其游戏性、娱乐性有所减少，在创作形态上无疑更符合普通诗人的创作要求，接近普通诗人的常规化写作，照顾到诗思不够敏捷的诗人，因此受到大多数诗人欢迎。

三、速吟而精准：分题分韵诗歌的集体评价标准一般而言，当诗歌创作的娱乐性、游戏性成为其首要功能，其思想性、艺术性则不免退居其次。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酒席上产生的分题分韵诗歌，显然不如诗会上的质量高。应该说，虽然大多数情况如此，但也不尽然。因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优劣高下基本取决于诗人的综合创作素质和能力，并不取决于具体的创作环境。

现存的分题分韵诗歌未见有大型总集，由一次活动而结成的“全集”留存的也不太多，通常附录于组织者或参与者的别集或其他总集类文献中^①，大多数分题分韵活动留存的诗歌只有一二首，散见于诗人的别集中，因为散佚作品比较多，很难全面考察。实际上，每次聚会作品都会有优劣高下之分，很难一概而论。这里先考察一下宋人是如何考核评价分题分韵诗的。

魏了翁对有意设置高难度形式要求的创作持有强烈的否定态度，其《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云：“逮其后，复有次韵、有用韵、有赋韵、有探韵，则又以迟速较工拙，以险易定能否，以抉撻前志为该洽，以破碎文体为新奇，转失诗人之旨。”^[3]他批评的四种不符合他所认定的“诗人之旨”现象，其实就是当时人评论分题分韵及其他类唱和诗歌的角度与标准。

尤其是在“迟速”与“工拙”、“险易”与“能否”之间，“速”而“工”、“险”而“能”，无疑是时人最推崇的。速吟且精准，被看作是诗才横溢、诗思敏捷的标志，在集会创作活动中，远比苦吟而精工更受人们看重。贺铸有诗题《约十客同集金山，米芾元章约而不至，坐中分题，以“元章未至”分韵作诗，拈闾韵，应口便作，滞思即罚巨觥，予得“章”字》，“应口便作”式的“速吟”是不少分题分韵活动的要求和追求，而“滞思”无疑是这类活动的大忌。

诗人速吟而精准的事迹总被当时人们津津乐道。

《诗话总龟》卷一：徐锴字楚金，年十余岁，群从

宴集，分题赋诗，令为“秋”词，援笔立成。其略曰：“并梧分堕砌，塞雁远横空。雨久莓苔紫，霜浓薜荔红。”

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李仁甫（焘）十八岁为眉州解魁。时第二人史尧弼，字唐英，方十四岁，人疑其文未工也。赴鹿鸣燕，犹着粉红袴，太守命坐客分韵赋诗，唐英得“建”字，即席援笔立成，有云：“四岁尚少房玄龄，七步未饶曹子建。”后为张魏公客，不幸早世。

像徐锴、史尧弼这样年少而诗才机敏的人，在分题分韵活动中，最易脱颖而出，为人关注。既要有速度又要有质量，这种约定俗成的共同评论标准，无疑挑战诗人的临机应变的才能，促使诗人向这个方向努力。

速吟而精准的诗人自然成为分题分韵活动中最为活跃的“擅场者”。如苏轼，不仅在次韵诗上自由腾挪，在分韵诗上也颇有创意，他有一诗题云《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苦炎”字四首》。他才高学博，因而一次分得四韵、创作四首诗歌对他而言毫无困难，但对其他与会者就未必那么轻松。因此他时不时要代其他分韵者创作，如《人日猎城南，会者十人，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为韵，得鸟字》，苏轼写完“鸟”字韵，又因将官雷胜得“过”字韵而作不出，为之代作（《将官雷胜得“过”字代作》）；又如《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苏轼写完泽字韵诗，又因戴日祥道士作不出“四”字韵诗而为之代作（《戴道士得四字代作》）。像苏轼这样的诗歌天才，当然会对分题分韵这类活动乐此不疲。

分题分韵活动在宋代兴盛，正是因为有不少类似于苏轼的诗才，譬如彭汝砺，他最大的特点是写完个人所分之题或韵后，又有兴致、能力去写他人所分之题或韵，如他写过《围炉分题得书屏》，又和了另二人所得之题《和润之砚冰》、《和庭佐酒船》；写过《雪夜饮分题得雪字》后，又和另二人之韵《和深之饮字》、《和亶甫夜字》。这种做法自然是为了显示个人才思敏捷，行有余力。李纲《梁溪集》也有这种情况，如《是夜复乘泛碧斋，至北溪口，观新桥，与兴宗、志宏分题。予得“泛”字》，李纲写过“泛”韵诗，又有力

^①目前笔者搜见的有徐铉《骑省集》卷三《送钟员外诗序》及六人六首分题诗，宋祁《景文集》卷五《春集东园诗并序》及七人七首分韵诗，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子部艺术类）卷十七收录苏轼等八人分韵送别范中济的《元祐八诗帖》，《成都文类》卷十一以及《蜀中广记》卷六十三、《全蜀艺文志》卷十九皆收录的冯时行等15人《梅林分韵诗》，《宋诗纪事》卷八十四收录王清惠等14人的《送水云归吴》分韵诗等五种。将另撰文讨论。

量写《志宏得“碧”字,以诗来,次其韵》、《兴宗得“斋”字,以诗来,次其韵》。正是这样游刃有余的诗人,推动了分题分韵活动的兴盛不衰。

惠洪也是才大思精的诗人,他在分题分韵的创作活动中显然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的《夜坐分题得廊字》云:“夜凉静话欣同榻,春晚分题喜共窗。解笑疏狂才莫敌,诗禅美誉旧传双。”“诗禅美誉”对他人和对他自己而言,都是孜孜以求的声名。他在《陪张廓然教授游山,分题得“山”字,又得“先”字》云:“分题得难韵,下笔风雷旋。诗成愕众口,不复较后先。闲中有此乐,安用食万钱。”对于富有诗才的诗人而言,更高的竞技性带来的是更大的娱乐性,他们从竞技中得到了创作享受、精神愉悦。唐庚《受代有日,呈谭勉翁、谢与权》云:“文字能令酒盏宽,江山未放诗才窘。分题踊跃谁避席,得句欢呼同彼隼。”反映的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带来的快乐。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云:“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题分韵赋诗,于众中推一人擅场者。”不仅是唐代如此。宋代的分题分韵活动,虽不一定每场都要推举“擅场者”,但确实有不少称赏最“擅场”的诗句、诗歌或诗人的事例,如:

梁修撰周翰,一岁后苑燕,凡从臣各探韵赋诗,梁得“春”字曰:“百花将尽牡丹拆,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称之。

尝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宫池上避暑,取“绿阴生昼静”分韵赋诗,陈得“静”字。……诗成出示,坐上皆论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

顷在东都,一日陈去非、吕居仁诸公同予避暑资圣阁,以“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分韵赋诗,会者适十四人,从周诗颇佳,为诸公印可。^①

皇帝、馆阁同僚以及诗坛名流,作为活动的主持者或参与者,要在这类公开的赋诗竞技现场,发现、奖掖优秀的诗歌及诗人,并接受众人的复核,因此,他们必须持有当时普遍接受的公允的评价标准。

后人对分题分韵诗歌的评价,似乎会有意无意忽略当时娱乐性兼竞技性的现场,而以评价一般诗歌的标准来评价分题分韵诗歌。譬如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云:“欧阳公居颍日,与正献公及刘敞原甫、魏广晋道、焦千之伯强、王回深甫、徐无逸从道七

人会于聚星堂,分题赋诗,得‘瘦木壶’,其诗曰:‘天地产众材,任材谓之智。……’识者于是知公有辅相之器。”“识者”称赏的是吕公著在分题咏物诗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气度。这个评价似乎与分题现场无关,但实际上,因为在短时间的强制“速吟”中,个人的涵养与本性会不加修饰、毫无保留地呈现,所以其间创作的诗歌,往往会成为他人观察作者眼界或性情器识的焦点。

方回从诗歌艺术技巧风格上评价朱熹《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得“归”字》云:“予尝谓文公诗深得后山三昧,而世人不识,且如‘故山此日还佳节,黄菊清樽对晚晖’,上八字各自为对,一瘦对一肥,愈更觉好。盖法度如此,虚实互换,非信口信手之比也。山谷、简斋皆有此格。此诗后四句,尤意气阔达。”^[3]方回竟然从朱熹的分韵诗中看到了江西诗派的影响与特点,他在评价时似乎并没有考虑现场因素。

龚颐正《芥隐笔记》评论王安石的分韵诗云:“荆公在欧公坐,分韵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消魂,唯别而已’分韵。时客与公八人,荆公、子美、圣俞、平甫、老苏、姚子张、焦伯强也。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诗。‘采鲸抗波涛,风作鳞之而’,盖用《周礼考工记梓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又云‘春风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宾客,两忘我与而’,最为工。”在这里,王安石押险韵而妥帖工稳,字词有出处,一时速吟出两首险韵诗,令人叹为观止,但即便是排除其现场因素,王安石的诗歌也是好诗。

忽略“现场”的评价,自然是更为客观公正的评论,这说明评论家们没有因为“现场”因素而降低诗歌评论标准,而分题分韵诗歌的质量确实能经得起统一的检验标准。在这些评论里加入现场因素,更会加强对诗人诗才诗思敏捷的尊敬。

尽管宋代也有不少人如魏了翁《古邠徐君诗史字韵序》所云:“诗以吟咏情性为主,不以声韵为工。以声韵为工,此晋宋以来之陋也。”(《鹤山集》卷五十二)但是宋人的分题分韵活动从未停止,而且品评分题分韵诗歌优劣一直是宋人诗话中的常见话题。

四、知识层的集体风雅:分题分韵的普及程度与规模

宋代分题分韵活动的主体是官僚士大夫文人,

^①三段分别出自释文莹《玉壶野史》卷五、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十四《陈简斋葆真诗》、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跋苏召君楚语后》。引文后二节之“韵句”分别出自韦应物《游开元精舍》与杜甫《又作此奉卫王》。

集会而能诗,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官员必备的技能。当时的官场同时也是诗坛或文化圈,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集于一身的士人,会将官场集会变成文化集会,将彼此的官员关系变成文人关系,因而显得超越世俗而温文尔雅。因此,不少分题分韵实质上是官场活动的风雅化。南宋时期,分题分韵甚至还成为权臣笼络朝士的手段。张仲文《白獭髓》云:“开禧初,权臣将用事之,日以所赐南园新城会诸朝士。席间分题,各赋春景,以都城外土物为题。”(《说郭》卷三十八上)韩侂胄深知官僚文人的审美情趣与风雅爱好,所以才以集会分题赋诗的方式笼络“朝士”。士大夫文人是当时知识层的主力军,无疑也是宋代分题分韵活动的主力军。

僧人和隐士也是分题分韵活动风气的积极推动者。九僧之一的希昼《书惠崇师房》云“几为分题客,殷勤扫石床”,可知当时僧人中有专门的“分题客”,客人专为“分题”而来,而主人事先知晓,具礼以待,主客之间在石床上以分题赋诗为交流方式。刘放《中山诗话》记载僧朋多诗句有“诗因试客分题僻,棋为饶人下着低”,证明了这一点。契嵩《镡津集》卷二十一附录杨蟠《有约冲晦宿东山禅寺精舍先寄》云“先凭报信春枝破,预想分题雪屋寒”,说明隐士或有隐逸情趣的士人会到清静的寺庙里与僧人一起分题分韵,在那里,他们的活动比起士大夫集会更多几分清静与从容。

分题分韵活动在宋代还进入了家庭聚会,这意味着这种活动参与了低幼知识层的家庭教育培养,如《龙学文集》卷十四记载:“翰林李学士宗谔,休澣,与子弟家燕,有太常丞刘仲宣,是日与会,酒酣,因探题联句。”年幼的学子,在家庭活动中就被训练出这种技能,以便在走上社会时能应对自如。家庭集会时,女性也会参与其中。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记载:“浮休居士张芸叟,久经迁责,既还,怏怏不平。尝内集,分题赋诗,其女得‘蜡烛’。有云:‘莫讶泪频滴,都缘心未灰。’浮休有惭色,自是无复躁进意。”女性也加入到分题分韵的创作活动中,而且还能以诗进谏,可见这种活动的普及流行程度。

宋代分题分韵赋诗的聚会规模,从二三人到二三十人不等。人数一般可以通过分韵的“韵句”字数看出,因为“赋韵者”或“主约人”会根据人数来选择相等字数的“韵句”。

一般认为南宋大型的聚会赋诗较少,但杨万里描述的一次分韵赋诗却可以看出当时的阵势。《诚斋集》卷十九《二月二十四日,寺丞田文清叔及学中旧同舍诸友,拉予同屈祭酒、颜丈几圣学官、褚丈集于鹵湖。雨中泛舟,坐上二十人,用“迟日江山丽”四句分韵赋诗,余得融字呈同社。》因为有20人,需要一首五绝来做“韵句”。《诚斋集》卷二十《钱赵子直制置阁学侍郎出帅益州,分“未到五更犹是春”二十八字为韵,得犹字》,以贾岛的七绝^①为韵,人得一韵,可知这次聚会有28人。

元纳延《金台集》卷二《读汪水云诗集》云,汪元量自大都南归时,当时南宋故国君臣“与宫人王昭仪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韵赋诗,以钱其行”(汪元量《水云集》附录此文)。29人的分韵赋诗,应该是宋末元初较大型的分题分韵活动。

宋末元初,分题分韵赋诗的规模日益扩大,俞德邻《佩韦斋集》卷十一《龙兴祥符戒坛院分韵诗序》记载“至元辛卯六月”“明庆宗师虎岩良公”举办的大型聚会,人数之多,可以通过所分之韵看出:“则又析少陵《已上人茅斋》^②诗,探韵以赋,客多诗字少,或再韵,或三韵,虽迟余不至,亦虚‘下’字畀之。”^③40个韵字尚不够,还要再三重复,可见人数之多。到了明代中后期,“王孙承塚,齐庶人后,于万历三十二年中秋日,大集四方名士百二十人,于金陵分题赋诗,承塚名由此大著”^④。这种特大规模的分题赋诗活动,具有明显作秀性质。而宋代的分题分韵聚会,现存记载中尚无这样上百人的规模。

后代的分题赋诗在“题”之细化上愈演愈烈,例如清朝徐世沐有《周易惜阴诗集》三卷,“是书取经传字义分题赋咏,或为四言赞、或为五言七言诗,多至一千余首”。个人分题行为竟发展到以经书字句为题,实在是太过夸张。而宋代的分题分韵,也还没有泛滥到这个程度。

即便如此,这种分题分韵活动在当时已经风靡知识层,不少人费尽心力编纂这类创作活动需要参考的类书、韵书,理学家们对此尤为不满,认为这是士风不振的重要原因。魏了翁竟在给古邨徐君所作的《韵学》一书作序时,毫不客气地批评其书是趋时顺风,白费功夫:“重以纂类之书充厨满几,而为士者,乏体习持养之功,滋欲速好径之病,流风靡靡,未之能改也。”

① 贾岛《三月晦日》:“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五更犹是春”。

② 杜甫《已上茅斋》:已上茅屋下,可见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

③ 姚之骅《元明事类钞》卷三引《明史稿》。

今古邨徐君,乃取杜少陵诗史,分章摘句为《韵学》四十卷,其于唱酬,似不为无助矣。然余犹愿徐君之玩心于六经,如其所以笃意于诗史,则沈潜乎义理,奋发

乎文章,盖不但如目今所见而已也。”^[4]在理学家看来,士人不应该如此花费心力在具有高难度挑战性的诗歌创作上,这是当时知识层的另一种声音。

参考文献:

- [1]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全宋诗:第8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魏了翁.鹤山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Song Dynasty Poetry-making Activity of Assigned Topic and Metrics

LÜ Xiao-huan

(Popular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poetry-making activity of assigned topic and metrics would appear sometimes as a highly entertaining minor part in feasting and drinking activities, and sometimes in the periodical or incidental poet gatherings. It was often accompanied by chess-playing, drinking, traveling, and feasting activities with highlighting poetry-making and competition. With different production context, the poets' mentality in poetry-making is surely different. Yet for the majority of on-site and off-site critics, the fast-composed works of superb quality is undoubtedly a universal standard. The hierarchical notion and noble pursuit of the Song scholars boosted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is competitive and entertaining activity, making it an established custom for th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context; universal standards; popularization class; medium size
(责任编辑 张彩霞)

(上接第6页)

Ecological Marxism: Dual Dimensions in Surveying Social Developmental Momentum

ZHENG Yi-Sh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doctrines of the humanitarian and scientific trends of western Marxism which puts the emphasis on either subjectivity or objectivity, ecological Marxism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ity, devotes to digging up the ecological thought resources in Marxist texts and introducing the concepts of "culture" and "nature". In its attempt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has uncovered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dimensions in surveying labor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opening up a dual dimensional trend which stresses not only on the subjective value but also on the objective natural value in examining social developmental momentum.

Key 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social developmental momentum; dual dimension
(责任编辑 张彩霞)